

贫困斗士

安德列亚斯·阿德里亚诺介绍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贾米尔
贫困行动实验室 (J-PAL)，埃斯特·迪弗洛与阿比吉
特·班纳吉正在这里重塑发展经济学

一些看似伟大的发展理念并不如预期那般成功。其中一个著名的失败案例是，根据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的倡议，用更高效、污染更少的炉灶取代世界上 30 亿最贫困人口所使用的明火烹饪。这个耗资 4 亿美元的项目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并由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于 2010 年启动。该项目旨在减少每年导致 200 万人死亡的室内空气污染，同时增强妇女权能并改善环境。项目最初获得了成功，但是 4 年后，印度建造的数百万个炉灶基本上都被废弃了。

为什么项目未能取得成功？来自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 (简称 J-PAL) 的研究人员前往实地了解了情况。在对印度东部奥里沙邦 (Odisha) 44 个村庄约 2500 户家庭进行跟踪调查之后，他们发现了许多看似并不重要的原因。研究显示，新炉灶需要经常维护，坏了之后无法维修，且做饭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由于烟囱向外排烟，因此也无法移到户外。

“对于生活在经济模型中的超理性生物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J-PAL 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阿比吉特·班纳吉 (Abhijit Banerjee) 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然而，这段经历提醒我们：“认为某件事情应该有效是不够的——它需要真正能够为使用它们的人服务。”J-PAL 成立 17 年以来，已经发展出一套科学且以证据为导向的经济学方法来消除贫困。据执行董事伊克巴尔·达利瓦 (Iqbal Dhaliwal) 说，这为“基于本能、意识形态或惯性的决策”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J-PAL 的总部位于剑桥市，在麻省理工学院一栋不起眼的大楼二楼，与波士顿隔着查尔斯河相望，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大型大学中一间普通的办公室。然而 J-PAL 的影响范围很广。这个由捐赠者资助的组织已经独自或通过世界各地的附属研究人员网络，在 80 多个国家开展了 1000 多项随机对照试验，将长期以来一直用以测试新药和疗法的黄金标准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学。J-PAL 表示，以这种方式验证的项目已经惠及全球 4 亿多人。

因为这项记录，班纳吉和他的妻子兼 J-PAL

联合创始人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 以及他们的朋友、经常一起合作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被授予了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们的实验研究方法现在完全主导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诺贝尔奖委员会说，这“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因为它能够提供关于“对抗全球贫困的最佳方式的可靠答案。”

在一个越来越轻视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的世界里，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往往被政治信仰所左右，因此，J-PAL 可以宣称自己的观点是客观的，它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实地科学验证的证据提供政策建议。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一方面，它可以展现出明显的效果。

班纳吉和迪弗洛是 J-PAL 的核心。他们在 2003 年与前哈佛大学教授森德希尔·穆莱纳桑 (Sendhil Mullainathan) 共同创办了这个名为“贫困行动实验室”的组织。穆莱纳桑现在仍然是 J-PAL 的贡献者。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世界对待贫困的方式。

2005 年，为了纪念穆罕默德·贾米尔 (Mohammed Jameel) 的父亲，实验室改为现在的名字。穆罕默德·贾米尔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也是沙特商人和慈善家，他的家族基金会一直是 J-PAL 的资助者。其他资助者包括大型私人捐助者和先进的经济发展研究机构。

J-PAL 的员工包括大约 400 名研究、政策、教育和培训领域的专业人士，总部设在剑桥市，并在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欧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设有区域中心。另有 200 名研究人员负责监督由约 1000 名承包商执行的项目。自 2003 年成立以来，该组织已为资助新的研究拨款 6300 万美元。

虽然其最初的研究重点是贫穷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但是 J-PAL 如今也在积极研究欧洲促进移民融入社会的举措等。其北美分部设有工人再培训和技能发展、无家可归和住房、刑事司法改革和卫生保健等项目。

分而治之

47岁的法国经济学家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使其打破了禁止雇佣自己学生的规则。她将J-PAL方法核心的随机试验描述为“将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几个可管理的小问题，这些小问题需要得到严苛的答案”。

该方法包括通过比较接受治疗的实验组与没有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来测试发展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例如，如何增加蚊帐的使用来防治疟疾）。实验组与对照组应尽可能相似，并且随机产生，这样就不会有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也可以了解治疗的影响。可以设置多个组来比较不同的解决方案。此类试验兴起于19世纪，在农业、医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应用要比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早得多，而首次将其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宏观经济研究常常涉及用复杂的方程来表达崇高的主题，并用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技术加以检验。就连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会为其中的一些问题而苦恼。迪弗洛和班纳吉在2019年出版的《艰难时期的优良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中承认，部分生产率的增长“无法用经济学家能够衡量的事物的变化来解释。为了让我们自己感觉更好，经济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全要素生产率”。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将这个概念定义为“衡量我们的无知”。

相比之下，发展研究可能听起来平淡无奇。肯尼亚的防疟疾蚊帐应该采取赠送、补贴，还是按市场价出售的方式投放？在美国，回购计划是否是清理大量未使用的阿片类药物的可行方式？如何确保印尼的贫困家庭能够获得按照某项联邦计划应该得到的所有大米？

面向穷人的信息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社会援助计划之一是为穷人提供大米，当地人称之为“拉斯金（Raskin）”。

J-PAL的执行董事伊克巴尔·达利瓦。

这项每年耗资15亿美元的系统旨在以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每月向最贫困的家庭发放15公斤大米。然而，官僚主义和腐败正在成为障碍。负责分发大米的社区领导经常在定价、津贴或资格标准上做手脚。符合条件的家庭最终只能拿到他们应得配额的三分之一的大米，而价格却比原定计划高出40%。

2012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加强控制，而是指派研究人员与J-PAL合作，测试如何利用带有信息的“社会保障卡”提高人们对资格标准、每月配额和价格的认识。随机测试表明，这项举措非常有效。政府在一年内发放了大约1500万张，并将另外两个现金转移项目捆绑到该项目中，总计超过40亿美元。

预计理论与实践之间会存在差异是J-PAL方法的一个优势。所以，不要假定训练有素的实验室科学家就比他们希望给予帮助的那些人更聪明或更理性。

“恰恰相反，穷人和其他人一样理性”，班纳吉和迪弗洛在2011年出版的《贫穷的本质》（Poor Economics）一书中写道。“正是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我们经常发现他们会对自己的选择仔细进行思考：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成为老练的经济学家”。

印度波杰布尔，
妇女在炉灶旁。

照片：THOMAS CHUPEN

班纳吉是哈佛大学博士，1961年出生于孟买，父母都是卓有成就的经济学教授。他对那些活在模型里的“超理性”生物没有多少耐心。他认为，很多宏观经济研究都存在“假定的知识”，这种假定往往只源于“一大堆大多很难解释的相关性，以及一些可能相当可靠的实际具体事实。”对于这些假定，他嗤之以鼻。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小办公室里接受了《金融与发展》的采访。在一扇贴满经济学和政治漫画的门后，摆满书籍的狭小空间与查尔斯河和波士顿天际线的开阔视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迪弗洛的办公室稍微宽敞一些，与班纳吉的办公室隔着两扇门。他们相识于1999年，当时她是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导师。2015年，俩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并育有两个孩子。

她已经学会了永远不要对任何一组研究结果感到失望。“我们很早就从随机对照试验中学到了一点，那就是你通常会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她说。

部分可以拼成整体吗？

把一个大问题分解开来，并不一定意味着较小的问题更加简单。在2016年IMF的一次讲座中，迪弗洛介绍了几项研究，展示了微观干预如何产生重大的宏观影响。其中一项涉及在印度古吉拉

特邦污染严重的纺织厂更好地执行环境法规。全球一些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就位于古吉拉特邦。这项随机试验改变了政府为各家公司指派巡视员的规定，并且发现如果巡视员的薪酬不由其所负责的公司支付，法规的执行情况就会有所改善。尽管这并不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但是数据的支撑更能说明问题。

迪弗洛认为，通常国际机构的广泛性指导原则（例如民主和善治）可能价值不大，因为它们过于笼统。经济学家可以通过维修管道来取得更具体的结果，管道是任何系统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部分，人们只有在它无法正常运转时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她将讲座的题目定为“经济学家的角色是管道维修工”。

随机对照试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小问题的答案加起来未必能够解决大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不强。例如，在肯尼亚进行的一项疟疾研究的结果可能与巴西完全无关。经济学家称之为“迁移性”问题。

苏格兰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证明一种疗法在一种情况下有效只能极其微弱地证明它在其他地方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迪顿写了几篇论文，阐述了他对随机试验的

保留意见。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将一项研究的发现应用于新环境的唯一方法是利用“以前的知识和理解”，“在某种结构内”解释试验结果，“有些矛盾的是，RCT(随机对照试验)的可信度来自拒绝使用这种结构”。

宏观与微观

11年前，时任 J-PAL 执行董事的达利瓦 (Dhaliwal) 受聘来解决这一具体问题。他是一位语速很快的印度经济学家，拥有德里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他的妻子是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 (Gita Gopinath)。

“2009 年埃斯特聘用我的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从研究结果转化到政策行动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达利瓦说。为了弥合这一差距，必须让政策制定者能够获取证据，并且需要通过不同背景下的其他研究对其加以验证。此外，还需要对实验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以便对政策发现进行新的现实检查。达利瓦如是说。

当被问及如何最好地弥合研究与政策之间以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差距时，迪弗洛提到了《艰难时期的优良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一书。

“这本书和《贫穷的本质》以叙事的方式将我们对一个主题的了解呈现出来，让一切变得有意义，”她说。《艰难时期的优良经济学》汇编了大量的研究，驳斥了关于移民、劳工和贸易等主题的常见假设。它表明，经济学家通常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对，但却仍然无法在更广大的公众心中建立信任。班纳吉认为这是由经济学家的职业缺陷所造成的。

“人们之所以相信民粹主义，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经济学家了。”他说。

迪弗洛在展望未来时表示，她希望诺贝尔奖的认可能够将 J-PAL “提升到一个不同的水平”，并帮助其将工作扩展到气候变化等领域，协助各国政府提高工作质量，更好地利用他们收集的大量数据。

J-PAL 将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的方法甚至可以应用于气候变化这类典型的全球性问题。在墨西哥、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进行的实地研究表明，提高住宅能效的技术往往不能实现其承诺的节能效果。诸如更新电器、翻新房屋和房屋防风雨等措施的普及率很低。即便采用了这些措施，由此

带来的效率收益通常也会被更高的消费所抵消。

同样，在印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小农场获得咨询帮助和贷款以购买更高效的新设备之后，他们的产量和利润都增加了，但却并没有节约能源。迪弗洛将此归因于“优化行为”，这种行为在潜在收益的估计中往往没有得到适当的计算。

更大的问题

截至 3 月中旬，J-PAL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终止了一切行动以阻止 COVID-19 大流行病的蔓延。该组织迅速调整了业务，例如从现场抽调工作人员和增加电话调查。它提供资金，以迅速启动新的研究计划，如现金转账、数字识别和政府实践创新。

这场疫情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并表明掌握准确、及时的统计数据是多么的重要。它强调了利用政府的行政数据来改善决策和分享结果的重要性，“比实地调查更快、更便宜。”达利瓦说。

达利瓦说：“后 COVID-19 世界将重新评估政府在危机中的作用和价值，从而改善公共管理，使人们更加认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过去几年里，很多新的慈善事业都以政府是不必要的、可以绕过政府这样的信念为前提”，他说，“这场危机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都需要投资建设政府的能力，使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并能弹性应对像这样的重大事件。”他补充道。以快速紧急现金转移的能力为例，即使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项挑战。

达利瓦认为，冠状病毒疫情预示了气候危机可以引发怎样的危机。

“这场大流行向我们传达了几条信息。首先，大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其次，一旦达到临界点(传染病的社区传播或地球温度的上升)，就很难避免重大的破坏和大规模死亡”，他说，“所以，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也表明，如果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比如保持社交距离)，并且彻底执行，就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FD

安德列亚斯·阿德里亚诺 (ANDREAS ADRIANO)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